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和平与战争 | 国际关系理论 | [法] 雷蒙·阿隆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Documentary Press

国际法自然而然地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和平年代，各国应当谋求相互之间最大的福祉，战争期间，各国应当尽一切可能减少彼此之间的破坏，不要损害各自的真正利益。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1954年，我在发表于《法国政治科学评论》题为“外交星宿分析”一文的注解中，提出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学。几年来我一直思考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那段时间主题进一步扩大了，在我看来，为了在不同的概念层次把握一个社会宇宙可以识辨的实质特征，根本的是要区分理论、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最后，本书尽管主要讨论当今世界，但其深层目的和当前并无关系。我的目标，是充分理解政治组织化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所隐含的逻辑。围绕理解而进行的全部努力以一个问题而告终，这一问题将决定人类的未来。

国家，从今以后有能力甚至不解除彼此的武装就能湮灭彼此，将会发现真正和平共处的意义吗？我并不主张给出答案，只有历史能够作出回答，但是或许本书有助于读者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的复杂性。^①

1959年7月 韦南松

1961年10月 巴黎

^①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在我完成此作品过程中给予帮助的机构和人们：哈佛大学，任命我为1960—1961学年福特政府学教授，给予我数月的学者闲暇时间；苏珊娜·墨索里尼，不知疲倦地誊写和重新誊写了几乎只有她才能辨认的手稿；伊莎贝拉·尼科尔，编辑了文本；皮埃尔·哈斯内，翻译了英文引文；斯坦利·霍夫曼和皮埃尔·布迪厄，提出了重要的修改建议。

中文版序 被时光埋没的智慧

雷蒙·阿隆这部《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成书于1961年，1962年在巴黎初版，大概是最雄心勃勃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总共四大部分（分别为政治学理论、社会、历史和人类行为学），24章，约70万字。作者显然希望此书能在国际关系理论经典文库中占据一个重要席位。阿隆自己在去世不久前出版的回忆录中说，他为这本书思考了十多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度过了整整一个学期。阿隆对此书的期望甚高。他写道：不出所料，我受到（法国）新闻界的高度赞扬。《外交世界》称之为“鸿篇巨制”；《世界报》上阿尔弗莱德·格罗瑟署名文章的标题是“雷蒙·阿隆的一部伟大著作”；埃蒂安·伯尔尼称赞为“政治修养和清醒思想的出色运用”；《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把我描绘成一名比武的欧洲骑士，把美国人垄断的国际关系研究夺了过来；……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摆脱那种欣快的感觉。^①然而，此书几年以后在大西洋彼岸发行的译本却未得到很多人的捧场。美国同行们的评价并不高，令阿隆相当失望。用他自己的话：大多数书评褒贬参半，可以适用任何一本书；普遍批评作品过于冗长，艰深晦涩；专业期刊上的评论近乎于奚落，说作者居然以诸理论集大成者自居，而太多篇幅的时事评论严重梗阻了理论探讨……基辛格对书的评价是“深刻、文明、杰出和晦涩”^②，令他略感安慰。法国同胞对此书大加赞扬，美国同行却贬损有加，不能说没有感情和不同偏好的因素作祟，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阿隆的思想和他这部巨著的重要价值及瑕瑜互见的显著特点。

注意阿隆在正文之前写的简短说明，会有助于了解其写作此书的基本意图，他这样写道“在我看来，为了从不同的概念层次把握辨识（世界）这个社会宇宙的实质特征，其根本是要区分理论、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我的目标是，充分理解政治组织化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所隐含的逻辑。”为此，阿隆调动自己

① 《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96页。

② 同上，第397、398页。

所有相关的知识思考积累，精心建构了一座用政治学理论、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行为学等经典思想理论支撑，以讨论当代“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国家间政治”的宏伟大厦。

阿隆在美国版序言中作了这样的说明：前两部分“理论”和“社会学”强调的是理解国家关系不可或缺的概念工具（conceptual apparatus），影响国家关系的决定因素（determinant）和通过历史研究所揭示的可能的常量（constant）；第三部分“历史”分析了我们身在其中的外交世界（和地球具有相同的时空范围），它受到热核武器的主宰，主要由美苏两大国支配。历史性解读的目标在于把握“二战”以后世界持久性的、也可以说是结构性的特征。国际政治理论著名学者斯坦利·霍夫曼（Stanly Hoffman）在后来悼念阿隆的文章中写道“《和平与战争》（1962）一书，写下了迄今最全面透彻、最令人信服的国家间政治理论。他在提醒读者政治的非道德性的同时，没有忽视或可称之为康德的哲学维度，即和平的道德必需与国家间‘战争状态’的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①作为阿隆的弟子并同为法国人，霍夫曼的高度赞扬不免带点感情成分，但他一语中的，点出阿隆关于和平与战争问题的庞大而复杂的思想脉络之要津：国家间政治与国内政治的最重要区别是，战争作为解决冲突的最后手段是从古至今的“自然法则”，避免战争的发生则是“和平的道德必需”，而在核时代更成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为最终能逃脱核大战的阴影寻找一条出路，是20世纪国际政治最重大的现实问题。

对生活在美苏冷战和建立在核威慑恐怖平衡基础上和平中的读者，阿隆问道：冷战与核武器造成的紧张和恐惧，能使我们发现真正和平共处的意义吗？这也是阿隆在书中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但他没有给出任何答案，说“只有历史能够作出回答”，此书“或许有助于读者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复杂性”可以说是阿隆对政治、尤其是国家间政治（外交—战略、或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中最重要、最深刻的认识。作为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军事、科技和文化诸领域因素的综合，复杂性是国家间政治的内在属性。阿隆在书中一再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国际关系不可简约的复杂性”。洋洋数十万字的宏论，作者来来回回周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旁征博引、辗转腾挪（以至于显得过于繁琐、絮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论证“国际关系不可简约的复杂性”。这恐怕也是阿隆这部力作对半个世纪之后我们认识当今世界最中肯的告诫。

阿隆对国际关系复杂性的深刻认识，来自于他个人的特殊经历和法国国家

^① 斯坦利·霍夫曼《雷蒙·阿隆（1905—1983）》，参见本书，第795页。

命运的跌宕起伏，他对欧洲政治历史、尤其是对当代国际政治从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层面进行的深入考察。基于对这种“不可简约的复杂性”的深刻认识，阿隆明确地告诉读者：国际关系没有简单预测性理论，“政治科学不是操作性的，不具备物理学意义上的操作性，甚至不具备经济学意义上的操作性。”^① 这恐怕也是阿隆特别强调“政治重要”的含义之一。

曾为阿隆学生、也是当代最好的欧洲问题专家斯坦利·霍夫曼对阿隆的解读也许是最中肯的。霍夫曼认为，阿隆“提出一种‘历史哲学’的观念，它既不是理性主义的也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是实证主义的。它强调在意图和结果之间，绝对承诺和暧昧行动之间，对动机和观念的理解和对规律的认识之间，前瞻性选择和回溯性阐释之间，部分历史的可解释性和把握历史整体的困难或不可能性之间，文化价值的多样性和理性观念（走向大一统的普世命运和最终梦想）的解读之间，作为温和改良主义的政治和作为救赎的政治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矛盾和紧张”。^② 在阿隆看来，正是这种普遍的矛盾性决定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以及国家作为政治单元在决策和行动上的局限性和被动性。面对这种复杂性，阿隆拒绝任何简单、武断的认定，坚持“对政治和社会现实进行近乎临床式的冷静解剖”，“关注不同社会活动的逻辑，以及这些逻辑和历史事件的相互作用”，“执着于两个问题：我们对历史宇宙和社会宇宙比如工业社会、外交政策能够理解多少；知识和行为之间有什么关系”。^③

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是形影相随的孪生兄弟，它们还有另一兄弟，就是可能性。同样是基于对政治复杂性的深刻认识，阿隆对不同政治体制的研究能够超越冷战时期相当普遍的意识形态极端化倾向，他相信政治制度的自治性质和不可简约的多样性。同样，关于国际外交体系的理论，阿隆认为体系的构成可以是同质或异质的政体。有美国学者评论，阿隆的这种理论特质使他能够不落俗套，按照政体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特征以及相关政体的性质，由里到外地解析国际关系，避免理论和观念上的傲慢。^④ 正因为如此，阿隆在书中对国际关系的理论探讨和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今天读来仍能感到其深邃的洞察力和强大的思辨力。

阿隆试图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尽量客观而全面地考察国家间政治的内

① 本书交易版序言，第3页。

② 斯坦利·霍夫曼《雷蒙·阿隆（1905—1983）》，参见本书，第794—795页。

③ 同上，第795页。

④ 本书交易版序言，第3页。

涵和表象，以少有的多维视角和综合论述方式来透析“不可简约的复杂性”，是阿隆在《和平与战争》这一巨著中要实现的目标。综合性是他对付复杂性的工具，同时也成为这本书的突出特点：阿隆思想和理论体系的综合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客观世界复杂性的主观反映物；大量吸收古今诸家思想理论同时又加以批判，难免有面面俱到的倾向。对相当一部分读者而言（尤其是国际关系方面刚入门的读者），需要以十分专注的精神和相当的耐心，才能在经纬交叉综合的分析论证中循着通往真知灼见的路径前进。在此，要感谢译者朱孔彦博士将斯坦利·霍夫曼为悼念阿隆去世而写的《雷蒙·阿隆（1905—1983）》一文与丹尼尔·马哈尼和布里恩·安德森为该书美国版所写的序言都一并翻译刊出，这对读者了解阿隆其人和他的思想，把握《和平与战争》一书的主要脉络与观点会有极大的帮助。

阿隆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本质上是保守的，强调“现实”作为“存在”的合理性，认为激进的革命理论和行动是简单、狂热的产物，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持批判态度，在法国属于政治上的右翼保守派政论家。阿隆在中国几乎算不上知名，在法国的名气也大不如作为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左翼社会活动家的萨特。曾为同窗好友的两个人因为思想理念的不同分道扬镳，以致成为政治上的对立面。阿隆生前大部分时期在法国知识界和政界的处境都因其特立独行、不合时宜的表现而颇为孤立。他的思想理论的复杂丰富性和政治见解的独到深刻性，在其死后逐渐被人们所认识。霍夫曼的悼念文章为我们了解阿隆其人及与法国知识界的关系，他思想主张的多面性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参考。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朱孔彦博士利用业余时间独自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其工作量和难度之大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巨大的热情、专注精神和毅力绝不可能做到。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待翻译工作持高度认真严谨的态度，查阅、对照大量参考资料，对译文作反复校对、修改，保证了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和平与战争》中文版具有较好的翻译质量。此外，朱孔彦博士还为此书添加了大量准确又通俗的译注，无论对专业还是一般读者，都提供了很大便利。

阿隆的《和平与战争》这部重要著作中文版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国际关系领域出版外国译作方面的一个空白，对美国学者论著一统天下的局面多少也是一种平衡，可说得上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崔立如

2011年10月于北京

交易版序言

不久以前，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似乎还方兴未艾。苏联及其中欧、东欧的卫星国分崩离析，欧洲联盟走到一起，民主制度在全球迅速勃兴，自由市场高歌猛进，不断扩大经济繁荣与增长的区域。政治思想家和权威人士开始高谈阔论，纵论以民主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的“历史的终结”，纵论民族国家的不合时宜，纵论世界主义的“万民法”。至少在一些人看来，我们似乎正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后政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历史中传统的敌意、盛怒和冲突都将统统让位，取而代之的是追求成功管理和规避无聊倦怠。^①

令人发指的“9·11”暴行，美国在阿富汗挫败塔利班，迫在眉睫的伊拉克战争，北约内讧，印巴之间的核边缘政策，一度欣欣向荣的网络公司的崩溃，经济保护主义的抬头——今天的世界看起来又是如此不同。政治报复性的回归，使得上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乐观主义显得多么天真幼稚。^②

法国伟大的自由主义者雷蒙·阿隆，对政治的顽固持久性就不会感到意外。阿隆于1962年首次以法语出版了《和平与战争》。在这部令人敬畏的力作之中，阿隆认为，国际关系素来就是独立主权国家的领域，将来也很可能一以贯之：独立主权国家唯恐失去它们的利益和威望——用书中公式化的表述，即它们的“权力、荣耀和观念”，拒不放弃自己的权利，至少在其领土之内使用武装力量捍卫其利益和威望。这种国家之间的部分自然状态（康德称之为国际生活中“反社会的社会性”）与国家内部的公民关系截然不同。从而，战争的可能性总是政治家关

^① 参见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Kenichi Ohmae, *The Boardless World: Power and Strategy in the Interlinked Econom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1); 以及 John Raws “The Law of Peoples”, 见 Stephen Shute 和 Susan Hurly 所编 *On Human Rights: The Oxford Amnesty Lectures*, 1993,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pp. 41–82。

^② 福山在“9·11”后对历史是否结束的最新观点，他的回答是：否。参见“Has History Started Again?” *Policy*, Winter 2002, pp. 3–7。

注的一个问题，因此也就理应成为任何尝试思考国际关系的中心所在。

政治思想家忽视“不可不察”的战争问题，就没有尽到他们职守范围内两个互为相关的主要责任：劝告政治家（在民主条件下还要教育公民）；尽可能准确、“科学”地反映政治世界的真实情况。《和平与战争》一书雄心勃勃，既力图描绘国家生活的持久面目，又力图对政治家和具有民主精神的公民陈情建言。为了指导读者阅读这一错综复杂的鸿篇巨制，我们在此提供该书主要论题的纲要。^①

阿隆在《和平与战争》一书中，从承认国家间的部分自然状态开始，详尽论述了国际关系的一系列分析工具。这些分析工具分为四个部分：理论、社会学、历史和“人类行为学”（即：与国家内部迥然有别的是，国家之间何为正误）。

在理论方面，阿隆基于权力和体系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框架。权力涉及外交政策的手段和目的。权力作为手段，使得一个政治单元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政治单元之上。阿隆认为权力有三个组成部分：领土、资源和集体行动能力。简单地看一看美国——幅员辽阔、东西毗邻两大洋，就能够理解领土如何影响权力。美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长期保护它免遭侵略，尽管洲际导弹的威胁以及使用生物、化学和放射性武器的恐怖分子的威胁，自然而然地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领土作为权力手段的重要性。至于资源，由于它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成为权力之源。美国凭借其生机勃勃的开放经济所带来的巨大财富，能够在全球以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方式发号施令。

领土和资源作为权力的手段至少是可以测量的。阿隆指出，相比之下，国家的集体行动能力取决于难以名状的精神资源。谁能预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格兰对纳粹德国的顽强抵抗？^② 一国可能比其国土或者财富水平表现的要

① 本序言采用和借鉴了一些对《和平与战争》更为详细的论述。参见 Brian C. Anderson, *Raymond Aron: The Recovery of the Political*,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7, pp. 121–165; Daniel J. Mahoney, *The Liberal Political Science of Raymond Ar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2, pp. 91–110; 以及 Bryan – Paul Frost, “Raymond Aron’s Peace and War, Thirty Years La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51, Spring 1996, pp. 339–361。

② 集体行动能力，作为政治领导的结果，可能增加或减少——这是国际关系中另一个无法衡量的变量。阿隆在其他地方强调了这一点：“没有丘吉尔，英国能够独自坚定抵抗第三帝国吗？……传统的历史是行动，亦即由人们在恰当时间恰当地点作出的决策所构成。这些决策可能不同于另外一个人在相同局势中所做的决策，也不同于同一个人具有另外的处置权时所作出的决策。无论事前还是事后，任何人都无法确定某些具体地点、具体时间作出的决策所产生的后果的界限。”参见由 Daniel J. Mahoney 所编录的 Raymond Aron, *In Defense of Political Reas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4, p. 138。

远为强大。

然而，国家运用权力，究竟目的何在？阿隆坚持认为，在于国际关系不可简约的复杂性。他并不苟同诸如肯尼斯·沃尔兹一样的学者的观点，将权力运用的目的归纳为对权力和权势的“结构性”竞争，或者像安东尼奥·内格里等新马克思主义者一般，概之为国家行为背后的资本主义机制。^① 国家追求众多目标，从自给自足的梦想，神圣的观念，到国家影响力乃至更加宏伟远大的抱负。

目标不可简约的复杂性，意味着我们至多能够认识到国际关系中的可能性。国际关系没有简单预测性的理论。诚如阿隆在《和平与战争》的结尾指出，“无可争辩”的是，“政治科学不是操作性的，不具备物理学意义上的操作性，甚至不具备经济学意义上的操作性”。^② 阿隆赞同亚里士多德的信念：“如果一个论证的清晰程度符合论题，论证就足以成立，因为各种类似的论证正如不同工艺的产品，我们不应追求它们要具有相同程度的准确性。”^③ 推测，更多的是艺术而非科学。

阿隆“理论”框架的第二部分是外交体系。外交体系由相互联系的政治单元组成，政治单元发现自己不可阻挡地被拖入到扩大化的战争之中。阿隆指出，体系的构成可以是同质或异质的政体，也就是说，政体追求相似或不同的目标，具有相似或不同的宪法准则。同质和异质混合的体系也是可能的。当下，西方民主国家和伊朗、伊拉克属于异质体系，民主国家自身是一个同质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属于混合体系，不同的政体同仇敌忾并肩作战，不一而足。尽管阿隆对政治政体的理解，不若亚里士多德那种涵盖所有生活方式的政体宽泛，但他一样赞同“政治重要性”这一强大观念。阿隆尤其尖锐地批判了“现实主义”的谬见：大国由“国家利益”观所驱使，国家利益或多或少不受政体根本变革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阿隆的这种理论特质不落窠臼，这使他能够依照政体之间的内在逻辑、历史特征以及相关政体的性质，由里及表、鞭辟入里地理解国际关系。这是一种

^① 参见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关于国家生活的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参见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② 参见本书，第768页。（引文和原文略有出入。“经济学意义上”原文为“某些经济学分支意义上”。——译注）

^③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 Irwin 英译本,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ers, 1995, Bk, I, 1094b.

避免理论傲慢和概念傲慢的方法。

阿隆提出综合性的“理论”框架以后，转向了社会学分析：对影响外交政策的形形色色的因素的研究。社会学家必须确定这些因素影响国家生活的程度。阿隆的观点是，社会学上的原因，一方面可以是物质的或者有形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道义的或者社会的。

《和平与战争》将物质上的原因归入三个主题。第一个是空间。阿隆像孟德斯鸠一样认为，环境可以影响、但并不决定国际关系。空间因素在地缘政治方面是关键性的，就像战役的战区 and 权力的势力范围一样。空间在国际关系中很重要，尽管今非昔比——考虑到人们普遍意识到，当今世界财富不再依赖土地和资源，而要靠信息和良好的经济，而且军事技术也削弱了距离对致命武器的屏障^①。阿隆思考的第二个物质因素是人口数量。阿隆相信，在辨识人口如何影响战争与和平方面，人们难以得出一个充分可靠的推论。经济起伏也并非不可避免地引发战争或者促成和平。正如总是赞同阿隆的主张，我们的推测处在或好或坏的王国，而不是决定主义的预测论。

阿隆更多地关注和平与战争的道义和社会成因。了解一个特定政体或者政治文化的性质，对于判断其如何行动是绝对必要的。阿隆经常论证，苏联的外交政策大多从意识形态中寻找支撑。一俟苏联政体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它就一味地寻求与自由民主社会的战术性和平。后共产主义的俄国，由于困难重重和貌似腐败成风，它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与仍旧作为共产主义国家的可能表现就大相径庭。无视政体之间的差异，对国际关系作出的政治判断就会黯然失色。

人类本性需要战争也不是事实。阿隆在一段强有力的文字中写道：

暴力的危险应当明确消除，这违背了人类的本性：每一个共同体之中，不合时宜的人会触犯法律，攻击他人。个体之间或者团体之间的冲突应当消失，这违背了个体或者团体的本性。然而尚没有证明冲突一定要表现为战争现象，尽管数千年来我们一直历经战争——有组织的战士使用越来越具有杀伤性的武器。^②

^① 关于军事技术，参见 Raymond Aron, *The Century of Total War*,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关于知识作为财富的来源，参见 Michael Novak, *The Cathol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pp. 112 – 143。

^② 本书，第 366 页。

不同的政治体制可能表达不同的人类暴力倾向，有些政体比其他政体更为敏感，有些政体破坏性更小。政治重要。

阿隆《和平与战争》的第三部分是历史，具体地说，是自20世纪以降直至60年代早期的历史。尽管所举的事例看起来时过境迁，然而事实上其论证仍惊人地切合时宜。阿隆深入体察了技术革命和外交全球化——他相信这一现象标志着“全球历史”（universal history）的开端。^①没有人能否认这两个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将发挥突出作用。阿隆正确地强调指出，虽然技术和全球外交重要，但它们并没有改变人类的本性以及人类组织的集体形式。历史的鲜明特征——人类、国家、政体的冲突，在1962年，或者2002年，都和修昔底德写作其历史巨著的时代一样真实。核武器和全球经济都没有终止历史。诚如阿隆指出，历史可能减速，但是只要人类和政体的斗争持续存在，历史就会继续“用血书写它的文字”。^②

正确理解理论、历史、社会学三个范畴，不仅给国际关系学科赋予了“科学”特征，而且使得审慎的政治家能够作出知情决策。从多方面来看，《和平与战争》的第四部分——人类行为学，是阿隆关于国际关系的规范性理论，也是该书最为深奥、最为意味深长的一部分。阿隆在这一部分探索了有关治国方略的两个持久问题。

第一个问题，阿隆称之为“马基雅维里”问题。外交政策必然邪恶吗？政治家可以正当合理地使用什么方法？正如《和平与战争》前三个部分所表明的，政治领导人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他可以依靠最多的就是或然性。他面对的是一个各国保留主权和大部分行动自由的外交世界。

政治家一个可能的现实选项，是理想主义的“法律道义观”（morality of law）。理想主义理论试图提出一套绝对的国际道义以超越国际无政府状态。阿隆拒绝这种方法，视之为鲁莽，也不符合道义。国际合法性和公正经常发生冲突。阿隆写道：

^① 参见 Raymond Aron, *Progress and Disillusion: The Dialectics of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1968。

^② 参见 Raymond Aron, *Clausewitz: Philosopher of War*,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 Hall, 1985, p. 412。

1933年，假如法国听从毕苏斯基^①元帅的建议，使用武力推翻刚刚攫取政权的希特勒，她就侵犯了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原则，她就没法承认德国具有自由选择政体和领袖的权利，美国公众舆论、道德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就会义愤填膺地加以谴责，他们忙不迭地要去挽救的不是纳粹主义，而是人民的意志和不干涉的规则。^②

但是法国那样做是错误的吗？

阿隆坚持认为，这个例证表明了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事实。由于国家仍是自身出于荣耀需要所作所为的独一无二的仲裁，政治共同体的生存，就仰赖政治家应对威胁时权衡武力、甚或必要时使用武力的决断。政治家手无寸铁，伪称“国际法”和“集体安全”将保护他的共同体就会招致灭顶之灾。事实上这种天真代表了一种道德失败。阿隆断言，“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了政治家，关心国家是政治家的首要义务。”^③ 理想主义宣传的观点强化了不公正。

然而，如果倡导国际关系道德的理想主义失灵，“斗争道义观”（morality of struggle）^④ 也没有做到更好。“斗争道义观”主张，考虑到独立主权国家存在的事实，政治家只要认为合适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从暗杀的诡计直至杀伤性武力的一切手段。批评家常常将阿隆描述为一个现实主义者。^⑤ 然而，阿隆尽管像现实主义者一样充分认识到独立主权国家的持续存在，但他并不接受国家的不道义是合法的、甚至是必需的。阿隆认为，尽管政治家对自己的政治社会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义务，各个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和丛林中野兽的关系相提并论”。^⑥

阿隆指出，某些自命（soi-disant）的现实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人性只不

① 毕苏斯基（Klemens Pilsudski，1867—1935），波兰国家元首（1918—1922），军事家、政治家和作家，被大部分波兰人接受和爱戴的独裁者，以及波兰第二共和国的领袖。在希特勒1933年1月步入权力中心后，毕苏斯基建议法国发起对德的预防性战争。这表明毕苏斯基也许在论及共同对违反《凡尔赛和约》、扩充军备的德国展开军事行动的问题时，试探过法国的意见。法国的冷漠也许成为了波兰在1934年1月签署《德波互不侵犯条约》的原因。——译注

② 本书，第580页。

③ 同上。

④ 本书，第608页。

⑤ 比如，Charles R. Beitz,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7–28.

⑥ 本书，第581页。

过 (tout court) 就是人性中黑暗与暴力的一面——人作为掠食动物。这就是纵容暴行，而暴行恰恰是现实主义者伪称唯一需要解释的东西。“即便在国家间关系方面，也体现了对观念、渴望和更高价值的尊重以及对（法律、道德）责任义务的关怀，”阿隆指出，“共同体彼此相待，极少表现得意气孤行，恣意妄为。”^① 现实主义者可能会否认这一点，然而道义仍然是政治史不可或缺的固有特质。

现实主义甚至把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一视同仁，认为国家无一例外地追求它们的国家利益。但在阿隆看来，视“基督徒”和“野蛮人”之间没有任何道德差异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这不道德，即便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也不明智。正如 20 世纪的历史所证明，民主国家对政治强盗的担忧甚于对其他民主国家的担忧。

阿隆认为，比“法律道义观”和“斗争道义观”都更胜一筹的，是他所称的“审慎道义观” (morality of prudence)。这符合国际关系的对抗性，然而也认识到共同的人性和某种道义的普世性。相比其他与之竞争的方法，审慎能够更好地理解现实和道义。“审慎的政治家宁要有限的暴力，也不要绝对的公正”，努力实现“符合国际关系世俗法则的、可以实现的具体目标，而不是无限度的、也许是毫无意义的目标，诸如‘一个让民主享有安全的世界’或者‘一个权力政治已经消失’的世界。”^② 这抓住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正确的一面，而矫正了两者过分的一面。

在国际关系不完全的霍布斯世界，国家保留主权，但仍承认一定程度的人类普适性，审慎道义观代表了政治智慧。如果国家放弃主权，世界会有什么不同吗？阿隆提出，这是有关全人类和平的“康德问题”，也是《和平与战争》的另一个探索。

有世界社会的迹象，但这些迹象大多相对肤浅。比如，由于 20 世纪的技术奇迹，出现了跨国社会。飞机和电视（以及当代的互联网）把世界各个角落都系统地联系在一起，“天涯若比邻”。阿隆指出，针对跨国社会的每一个标志，人们都能提出一个表现社会和文化发生更多冲突的逆标志。他补充道，我们的时代会更多地讨论人权问题，然而，任何一个极端年代——残暴横行、毁灭性战争肆虐的年代——的观察家，能够说人类社会四海一家的大同意识已经越来越深入普及了吗？在很多方面，人类和从前一样四分五裂。

① 本书，第 609 页。

② 本书，第 585 页。

正如阿隆解释的，只有法律或帝国能够克服这一“古老的”集体秩序，而这两种方法都不大可能获得成功。即便出现某种超级部落或者强制性政治意志，阿隆追问，难道它们就完全不会放大冲突的原因吗？不公正和怨恨，在众多政治共同体的内部造成紧张甚至导致革命，倘若一个大一统的主权国统一了众多的政治共同体，它就面临着消除不公正和怨恨的责任。这样的怨恨为什么会在普世国家或世界联邦中销声匿迹呢？那就意味着人类解决了政治本身的问题。

而且，一个后政治的世界就是合意的吗？它意味着强烈的国家身份感的终结。阿隆把政治特殊性的感觉视为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某种东西——因而也就是需要珍惜的东西。阿隆指出，“文化多样性，不是需要祛除的咒语而是需要捍卫的遗产。”^① 对此表示遗憾——诸如约翰·罗尔斯^②和其他普世自由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就是拒不承认这一点，这在对什么是个体的、什么是绝对普世的进行那种堂吉诃德式^③的追问中司空见惯。后政治的世界意味着要把人类的生存变得贫瘠乏味。

另一个既兼顾文化共同体需要，又能迈向普世和平的解决途径是追求联邦。可是，世界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瑞士吗？阿隆借鉴了理论家卡尔·施米特的观点^④，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乌托邦。阿隆颇为认同施米特的观点，即朋友与敌人的区分乃是政治的核心。将一个共同体凝聚在一起的力量，部分源于这个共同体对其他共同体的敌意。尽管阿隆没有从施米特的敌我区分之说推导出世界联邦的不可能性的结论，他却相信敌对是人类的本性，只能弱化，不能根除。这种弱化需要将一个共同体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因而就需要一个外部的共同体——如果不是一个敌人，也至少是另外一个共同体。阿隆察觉世界社会的扩大

① 本书，第750页。

② 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著有《正义论》、《万民法》等，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译注

③ 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这里堂吉诃德式的追问，暗讽不自量力、脱离现实、自以为是。——译注

④ 施米特在魏玛德国崩溃期间写作了《政治的概念》一书，他相信自由主义因为拒绝承认政治的暴力核心而无可挽回地注定失败——政治一律让敌人和朋友相互对抗。参见 G. Schwab 翻译、Leo Strauss 评注的英译本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i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施米特后来和纳粹搅和在一起，这无疑让他的声望黯然失色，然而他的著作提出了自由民主社会的迫切问题，正如阿隆所承认的一样。雷纳德（Philippe Raynaud）概述了人们或许可以称之为阿隆和施米特之间的“隐秘对话”。参见“Raymond Aron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Cahiers de philosophie et juridique*, No. 15, 1989, pp. 115–128。[施米特（Carl Schmitt, 1888—1985），德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对20世纪政治哲学、神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译注]

是可行的，然而它与世界的统一尚存天壤之别，后者就历史可能性的限度而言只是一个梦想。至多，人类统一体的概念可以作为“理性的观念”（idea of reason）^①，能够纾缓人类之间、政治共同体之间相互敌视的癖好。在这方面，严肃清醒和历史现实主义感，对于避免错误的现实主义和错误的理想主义两种极端都必不可少。

《和平与战争》也许是阿隆最野心勃勃的著作，阿隆有理由引以为豪，却从未感到完全满意。他很怀疑是否最终成功地将理论范畴和历史范畴结合起来，也担心书中包含太多当时正在逝去的事件的分析。无论如何，《和平与战争》都不是阿隆有关国际关系或者20世纪政治的最后著述。有必要与阿隆关于克劳塞维茨的权威性研究著作——阿隆认为那是自己的杰作——一并阅读^②，还有他关于20世纪历史的文章，目前以英文收录在《全球历史的到来：一个20世纪见证人文选》^③一书中。在被意识形态诱惑所错乱的年代，这些作品一并反映了阿隆的巨大成就，可谓权威的、人文的、可信的政治历史指南。尽管阿隆本人对《和平与战争》持保留态度，但对于那些想要理解和平与战争在事物的人类秩序中的地位的人来说，它仍然是一部不可或缺的案头之作。本书写作沿袭了阿隆知名的清晰语言和经典节制的笔法，它卓然不凡，跻身于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作品之列。在历史再度阔步前进，最近的乌托邦主义显得愈发肤浅的时代，《和平与战争》提醒世人：人类知识容易犯错，在一个危险丛生、并不完美的世界，人类道义既存在局限，又崇高壮丽。

丹尼尔·J. 马哈尼
布里恩·C. 安德森^④

① 理性的观念（idea of reason），在康德使用的理性这一措辞所表明的意义上，指它永远不能实现，但却驱动着行动，指明了目标。参见本书第页。——译注

② Raymond Aron, *Clausewitz, Philosopher of War*,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 Hall, 1985.

③ *The Dawn of Universal History, Selected Essays from a Witnes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Basic Books, 2002.

④ 丹尼尔·J. 马哈尼（Daniel J. Mahoney），美国阿桑普生学院（Assumption College，也译圣母学院）政治学副教授；布里恩·C. 安德森（Brian C. Anderson），《城市期刊》（*City Journal*）的高级编辑。——译注